

“实用”与“理性”的对峙和融合

——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理念演进的脉络及路向

殷琦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理念是制度与实践在思想层面的集中反映,对理念的考察成为观察与理解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重要面向。新闻传播学科的应用属性及其与“公共性”的紧密关联,以及台湾地区特殊的历史脉络与政经结构促成了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理念的独特演进路径:自台湾新闻传播教育诞生始,实用主义理念便在政策与市场的引导和支持下一直居于统领地位;直至“解严”后,社会力量的崛起、公民社会的成长与新闻传播学科自主意识觉醒方才推动理性主义理念在对实用主义理念的批判与反思中发展起来。近年来,台湾新闻传播教育试图在理性思维、人文素养与专业知识、通识教育与职业训练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其理念呈现出实用主义与理性主义融合发展的趋向。

关键词: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理念;实用主义;理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G21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9)05-0149-08

置身特殊历史脉络与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因其构建与变迁过程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及其在亚洲乃至世界新闻传播教育中所处的先进地位,理所当然地成为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重要样本。但既有关于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制度和实践层面,较为忽视其背后理念的转变与更新。事实上,作为人们对于某一事物或现象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其所形成的观念体系^[1],理念的考察不可或缺,它既是制度与实践在思想层面的反映,也是制度与实践不断发展与变革的指引与支撑。由此,对理念的形塑及演进过程的考察是我们认识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必不可少的重要面向。

作为贯穿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两大主导性理念,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经历了长时间的并存与对峙,理性主义者认为大学教育必须培养人的理性和传播理性知识,以追求真理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与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为基点,并极力主张知识应与市场和政治分离;而实用主义者则强调行动的实际效果,认为大学教育要直接为社会提供服务,成为社会大学(communiversity)^[2]。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中,这两种理念的冲突、较量与交织体现得更为明显与激烈:一方面,新闻传播学的应用学科属性使其天然地与实用主义理念相连,倡导新闻传播教育要培养社会发展所需的新闻工作者与传播人才,职业训练受到普遍重视;但另一方面,新闻传播领域又往往被视为“公共性”实践的重要场域,其品质与功能直接关系着作为理性讨论空间的公共领域的续存,这又使得讲求通过博雅教育与通识教育培养人的理性精神的理性主义理念在新闻传播教育中屡被强调。

收稿日期:2019-05-20

基金项目:“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育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殷琦,女,湖北孝感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在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特殊且复杂的发展历程中,这两种理念的形成与演进路径也颇为独特,它与作为高等教育起源地的西方国家中理性主义理念先行出现、实用主义理念后来居上的演变路径迥然相异。正因如此,本文从结构论与过程论结合的视角出发,关注特定时代语境与既定政治经济结构下政党、大众传媒业界、新闻传播学界乃至社会力量间权力消长及互动过程对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理念形塑及演进的作用及影响,并从中梳理出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理念演进的脉络与路向,以期形成对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发展更为完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一、威权统治下实用主义理念的形成

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诞生之初便为实用主义理念所统摄,这首先与其在建立与发展初期主要以美国新闻传播教育模式为参照对象密切相关。一方面,冷战时期的美国为了巩固自身在世界体系的地位、扩张自由经济体制以及遏制共产主义,积极地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意识形态,新闻传播教育、学术与实践成为其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途径,而台湾地区又被美国视作太平洋行动基地、瓦解共产主义的心理战阵地与遏制新中国的前沿堡垒。于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美国以“反共、国家发展、亲资本主义体系运作的社会意识为基础”^[3],通过对台援助^①来协助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如使用美国防卫资助的经费支持台湾政工干部学校新闻组^②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所的建立,还通过“富布莱特”奖学金、“亚洲基金会”以及洛克菲勒家族企业支持的“亚洲文化协会”等提供交流项目补助美国学者赴台讲学及台湾地区学生前往美国求学。

另一方面,国民党败退台湾地区后,由于国共对立关系的延续、国民党的亲美反日情结以及为寻求政治保护与经济支持所形成的国民党对美国的依附关系,增强与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的联系成为国民党当局进行“国民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于是,自20世纪50年代始,在美国资助下,国民党当局便不断邀请美国新闻传播学者赴台讲学以“增强国际文化合作:组设国际学会,以沟通国际学术文化,借为国民外交助力”^[4]。1954年到1969年间,仅经由“亚洲基金会”资助赴台讲学的美国新闻传播学教授便达7位。与此同时,台湾新闻传播学界也兴起一股留美风潮,王洪钧、徐佳士、漆敬尧、朱谦、李瞻等台湾地区“第一代”新闻传播学者纷纷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进修深造,他们学成返台后成为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中流砥柱,并将学习的美国新闻传播教育观念、培养模式以及主流新闻传播学理论与方法带回台湾地区。

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将媒体与教育视为增强民众对其政治认同感与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工具^[5],并在败退至台湾地区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以反攻大陆为由,将社会各个方面都纳入军事威权统治之下,且视媒体宣传与教育失败为导致其退台的重要因素,提出“当前最要紧的任务,就是发挥大众传播力量,强化心理建设和精神武装”^[6],并将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策略。相应地,国民党当局对新闻传播教育极为重视,提出“为辅导新闻事业并运用新闻宣传力量,以贯彻反共抗俄之‘国策’,完成建设台湾,反攻大陆之任务……政府应注意新闻人才之培养,开设新闻学系或新闻专修科以造就新闻人才”^[7],力图通过新闻传播教育来强化统治正当性与进行意识形态宣传:1951年台湾政工干部学校新闻组的成立是为了“培养军中高级文宣人才和情报人员,辅助台军加强政治作战能力”^[8];1954年台湾政治大学新闻所的复办也是为了“培养高级通才”以及落实为国民党当局统治服务的新闻传播教育宗旨^[9],并任命国民党党内主管

① 自从1950年6月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接受了美国援助总额达41.5亿美元,其中军事和经济援助分别约占57%和43%。参见牛可《美援与战后台湾的经济改造》,《美国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台湾政工干部学校于1951年7月15日成立,1970年10月31日更名为台湾政治作战学校,2006年9月1日改为隶属台湾国防大学,更名为台湾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

文化宣传的高级官员如谢然之、曾虚白为这两所新闻系的负责人。

于是,以职业性与实用性为显著特色的美国新闻传播教育模式^[10]颇为契合当时国民党当局正当化其威权统治的需要,并在国民党当局的有意引导、美国方面的推动及美国与台湾地区学者的影响下被引入到台湾新闻传播教育中。

因此,台湾新闻教育在开创初期便将党化教育与职业训练相结合:在开设“教育部”所规定的“三民主义”等政治类必修课程的同时,积极引入美国新闻传播院系尤其是重视实务教学并以职业教育为特色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课程体系,强调专业技能培养。如作为军事院校的政工干部学校新闻组^①以反共文宣训练为主并以美国教材为重要参考,开设了采访、编辑、评论等大量新闻实务课程^[11]。而政治大学新闻系也以实务性课程与英文写作类课程为主,这两类课程占到专业必修课的52%^②,且该系建立起专业实习、与业界合作等“从做中学”传统,如开办校内报刊《学生新闻》与英文报刊《政治先锋》(Chenchi Vanguard),以及安排学生在本科四年级时到新闻单位进行1个月的毕业实习。其他如台湾师范大学新闻组、文化学院新闻系等也都在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引下^③积极效仿政治大学,重视采访、写作与编辑等专业课程及实践教学建设。

20世纪70年代前后,实用主义理念在大众传播教育引入台湾地区后又得到进一步强化。一方面,以控制社会为旨趣并关注效果研究的大众传播学被国民党当局视为辅助其运用媒体推动台湾地区现代化建设与维护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12],另一方面,断绝与台湾地区“外交关系”后的美国,基于政治军事战略及经济利益考虑仍企图继续保持与台湾地区“强有力的非官方的实质关系”,并将传播学教育作为持续渗透的重要领域。于是,有着强烈实用主义与功能主义取向的美国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陆续被台湾地区新闻传播院系列为必修课程,大众传播学专业也在辅仁大学、淡江大学^④等学校中陆续开设。美国实用主义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及理念随之进一步在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领域扎根。

于是,在威权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台湾新闻传播教育被视为进行社会控制、塑造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工具,并将“以培养技能为取向”、偏重职业训练的美国新闻传播教育模式作为复制模仿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实用主义理念成为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统领性理念,并与威权统治紧密结合起来。

二、市场化转型与实用主义理念的延续

1987年的“解严”被视为台湾地区社会转型的分水岭,自此其政治体制从威权转向民主,经济上日益走向市场化、自由化与国际化,高等教育与大众媒体也被裹挟入此潮流中。台湾当局将高等教育与新闻传播业视为提升台湾地区“竞争力”的利器,并力图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推动其发展,新闻传播教育随之受到重大影响。

在高等教育方面,台湾当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数次修订“大学法”(1994年、2005年),确定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原则;颁布实施《大学校院增设调整系所班组及招生名额采总量发展方式审查作业要点》(2001年)及《技专校院增减、调整所系科班及招生名额审查作业要点》(2005年),对专业数量进行总量管控的同时给予大学专业设置自主权;陆续启动“奖励大学教学卓

① 政工干部学校新闻组于1959年第8期改为新闻系后,所有课程以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课程标准为准则。

② 根据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复系时期的专业必修课程统计得出。具体课程科目参见黄东英《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初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6-67页。

③ 1965年,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对台湾8个学院各学系的必修科目表进行修订,同时规定新闻系课程设置均须以台湾政治大学课程修正案为蓝本,其余科目可由各校自行设定并报教育主管部门核准施行。参见黄东英《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初探》,第69页。

④ 辅仁大学于1971年创办大众传播学系,淡江大学文学院于1972年开设大众传播学系。

越计划”(2005年)、“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2005年)、“发展典范科技大学计划”(2013年)等奖励计划对数所优秀大学提供竞争性经费补助等。这些政策措施在赋予大学自治权、控制公立大学规模、推动私立大学扩张、要求产学合作、减少普通性经费并设立竞争性经费的过程中,不断减少政府干预或资源投入,并将市场机制引入高等教育领域。于是,那些具有市场吸引力或能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具有应用前景的学科与专业受到更多青睐,作为应用性学科的新闻传播学也呈现出更加明显地为市场与经济服务的特点。

在媒体发展方面,20世纪90年代后“广电三法”(“广播电视法”“有线广播电视法”“卫星广播电视法”)的数次修订及“出版法”的废止等传媒有关规定方面的变动,将大众媒体从政党的全面掌控中释放出来,并恢复了其市场地位,使得台湾大众传媒产业步入开放与蓬勃发展的时代,而90年代台湾当局提出的“振兴经济方案”中建成“亚太媒体中心”的主张,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与信息社会的初现规模又进一步推动了台湾地区大众传媒产业的兴盛与结构转型,并提出了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加强应用性与技术性知识生产与人才供给的现实要求。

于是,高等教育与传媒领域中政治力量的“隐没”^①与市场作用的张大,使得台湾新闻传播教育从“解严”前被视为构建政党统治正当性、进行社会控制与意识形态宣传重要工具的身份禁锢中解脱出来,更多地作为市场主体寻求发展,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与改革以回应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取向及解决传媒产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实用主义理念继续在新闻传播教育中发挥重要影响。

首先,在高等教育与传媒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潮流下,“配合产业需求”与“扩大经济效益”成为台湾地区新闻传播院系进行扩张的首要动因^[13]。随着传媒产业规模的急速扩张,台湾地区新闻传播院系数量大幅增长,1991年底,仅11所院校设立了新闻传播相关系所,而截至2018年,共有31所院校开设了58个新闻传播相关系所及学程。其中,私立性质与职业技术类新闻传播院系数量增加最为迅速,目前已有25所私立学校开设了43个新闻传播相关系所及学程^②。尤其是近年来新成立或升格成立的科技大学与技术学院如朝阳科技大学、南台科技大学、和春技术学院等都开设了新闻传播类院系。新闻传播教育的办学结构也因此呈现出鲜明的市场导向与职业取向。

其次,市场表现对台湾地区新闻传播院系获取资源多寡的影响日益明显,能积极觉察新的媒体发展需求与满足传媒业界对从业者的职业期待的新闻传播院系,更易获得政府奖励与业界资助,以及增加在招生与就业上的市场竞争力。于是,在“实用”导向成为较好发展策略^[14]的共识下,台湾新闻传播院系纷纷将新闻传播与当下流行的科技与管理相结合,设立大量与之相关的专业与课程,诸如“传播与科技”“资讯传播”“新媒体与传播管理”“口语传播”“图文传播”等科系与专业大量兴起。而且,新闻传播院系中实务类与技术类课程也占据了极高的比例。以台湾地区最为知名的政治大学新闻系与世新大学新闻系为例,目前在它们开设的专业课程中,新闻业务、广播电影电视制作、多媒体制作、媒体管理及专业实习等技术性实务课程均达半数以上^③。此外,新闻传播院系还通过专业实习、多媒体实验室建设、教学工作坊以及产学合作案等途径提升学生的业务能力及与传媒产业形成密切关系。

再者,日益卷入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台湾地区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视为提高地区“竞争力”的重

① “隐没”即指政治力量并未完全从高等教育领域与传媒领域中退出,转以其他形式继续影响着大学发展与媒体经营。参见胡元辉《“黑暗之幕”将成事实?戒严与报禁解除二十周年的忧思》,见卓越新闻奖基金会主编:《关键力量的沉沦——回首报禁解除二十年》,台北:远流图书公司,2008年,第14页。

② 根据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公布的“大学校院一览表”(2018年度)数据整理,参见<https://ulist.moe.gov.tw/Query/AjaxQuery/Discipline/32>。

③ 根据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课程手册”(2018年度),参见http://comm.nccu.edu.tw/zh_tw/courses/undergraduate/105course2及世新大学课程地图(2018年度),参见<http://www.shu.edu.tw/Freshmen-info.aspx#a3>公布资料统计。

要途径^[15]在其国际化过程中,被视为新闻传播教育典范的美国新闻传播教育模式依旧是重要的学习借鉴对象。不仅台湾新闻传播院系近些年的课程改革仍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为参照,并采用美国市场导向的教育质量标准评估台湾新闻传播教育,而且教师学历背景也呈现出高度美国化特点。以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与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为例,从美国获得学位的专任教师者所占比例分别达到71.4%与48.5%^①。这都使得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教学理念、价值取向与课程体系仍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新闻传播教育模式的持续影响。

于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讲求“实用性”和重视“职业技术训练”传统在台湾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得以沿袭,实用主义理念依然引领着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但是,与之前实用主义理念的落实主要受到政治力量及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影响的情况不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实用主义理念的流行更多源于市场机制的牵引。

三、理性主义理念的兴起及其与实用主义理念的融合

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台湾新闻传播教育一直为实用主义理念所统领,理性主义理念是隐而不现的。一方面,作为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参照物的美国新闻传播教育虽大力倡导实用主义,却并未舍弃理性主义,密苏里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新闻传播教育“重镇”一直强调在职业技能训练的同时,也要注重新闻学理、通识教育与专业主义精神的培养^[16]。但出于维护政治统治的考虑,国民党当局在将美国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引入台湾地区时,只保留了其教育体系中“实用”的部分而刻意地过滤掉“理性”的部分。

另一方面,早期的台湾新闻传播教育自身也不具备孕育理性主义理念的条件。在20世纪60年代时,一些学者与教育者对当时台湾地区过于偏重职业技术训练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并尝试提出调整或修正方案。其中,政治大学新闻系的课程改革历时最长也最具代表性,该系主任王洪钧在1959年提出新闻教育应包括知识、技能、道德与方法四大教育内涵^[17],该系还于1963年5月主办了“新闻教育座谈会”,邀请了包括董显光、曾虚白、成舍我、谢然之、王洪钧等十多位政府官员、教育家和学者参加,会上专家就“新闻专业科目及学分不宜超过全部必修学分的三分之二”,“重视人文及社会科学之基本科目,尤以本国及外国语言最为重要,历史亦然,不应低于40%”达成共识。^[18]虽然这些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理性主义所倡导的加强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以促进个体知识与理性充分发展的想法,并引发此后数十年对新闻传播教育中专业课程占比过重现象的检讨,但相关论述较为零散、未成气候。特别是当时台湾地区的各种媒体及学校都被“统合”于国民党当局的威权统治之下,成为意识形态工具,新闻传播领域与教育领域的自主性尚未显现,公民社会也未被当局允许存在,因此,这些讨论也仅停留于感性经验层面,并未上升至思想或学理层面。

直至20世纪90年代,理性主义理念方才呈现出规模性影响。一方面,随着台湾地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逐渐朝着民主、开放与多元方向发展,各种政治势力与社会阶层集结而成的社会力量不断壮大,他们通过著书立说、社会运动等多种方式推动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对政治力量压迫与经济势力扩张的反抗以获得自主性,并提出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以及新闻自由等诸多诉求,且最终在政策与法律层面得到确认。在这一过程中,台湾地区新闻传播学科的自主意识被唤醒,新闻传播教育的自主性也被不断强调。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社会发展的独特性渐受重视、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兴起的背景下,一批学者也注意到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对

^① 根据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http://comm.nccu.edu.tw/zh_tw/member/faculties)与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http://www.ccsu.frog.tw/>)公布资料统计。

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依附所带来的学科正当性危机^[19]提出“传播学门应重视‘在地的意识’，……并将研究与实践深耕于建制化的传播教育制度与课程中，方能使久居边陲的台湾传播与研究获得其主体性”^[20]。

于是，台湾新闻传播学界对新闻传播教育中由于政治与经济力量压迫以及对美国模式依附所造成的长期以来过度宣扬实用主义理念与强调职业教育所导致的“背离博雅教育基本精神”^[21]及“理想性、自主性与批判性的失落”^[22]的现象进行了深层次与系统性的反思，并引发了规模性讨论。如台湾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新闻学研究》在1996年第53期、1999年第58期、2000年第65期分别刊登了《传播学发展现况》《纸上座谈会：从SCA易名谈起》《传播学入门科目的现实与理想》等主题论文或专题讨论。其中，钟蔚文、臧国仁与陈百龄的观念颇具代表性，他们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视角提出“过去传统传播教育过于偏重‘陈述性’的专业知识，使得传播教育无法满足或反映大学殿堂之学术要求。未来应以传播领域中的‘程序性知识’与‘情境知识’为教育核心，提供问题导向与资讯处理的知识，训练学生了解情境，并在模拟经验中学习自我反省。”^[23]这些观点得到众多学者的高度认同^[24]。这些论述在学理层面从人及其理性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台湾新闻传播教育所需的知识基础以及通识教育的价值与意义，强调传授理论知识和培养独立思考与批判能力，理性主义理念由此彰显。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对实用主义理念引导下的台湾新闻传播教育进行反思并不断形塑理性主义理念的过程中，人们也意识到理性主义理念与实用主义理念二者间虽然存在分歧，但并非完全对立，而且两种理念都存在缺憾，需要倚借另一方的力量予以纠偏，因此也存在融合的可能。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王石番和陈世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传播教育应“传递文化知识、培养学生传播学术能力、发展学生职业技能，以及重塑社会价值”，并规划出“兼顾专业养成、学术成长、通识教育”的“三脚模式”，^[25]力图在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之间达成一种平衡，这一观点成为此后台湾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三脚模式”的指引下，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先后于1998年与2004年进行学程制和“大一大二不分系”改革，鼓励学生将自身兴趣与专业训练相结合，并加大通识教育的力度。这些改革追求知识的平衡性与完整性，强调理性思维、人文素养以及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全面培养，体现着实用主义与理性主义理念相融合的积极探索。随后，一些新闻传播院系如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铭传大学传播学院陆续采用学程制以及“大一大二不分系”的教学方案，甚至连朝阳科技大学、南台科技大学等职业技术院校也随之跟进，如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强调“以理论与实务并重”的教育方向，而南台科技大学资讯传播系则宣扬“兼具人文关怀、创意思考与专业技能”的人才培养目标，融合理念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新闻传播院系接纳采用。

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正是在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学界对其新闻传播教育现状及实用主义理念进行批判与反思的过程中，理性主义理念逐步凸显。同时，尽管理性主义理念与实用主义理念的对峙与冲突依然存在，但两种理念的相互融合已渐成趋势，不少新闻传播院系正在积极探索可以将两种理念相互融通的教育制度安排，以及兼顾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整体课程框架。

四、结语

从结构论与过程论的视角回顾与梳理过去六十余年来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理念的演进轨迹，可以发现，无论是实用主义理念的长期统领，还是理性主义理念的新近崛起，不仅都受制于台湾地区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结构与政治经济体制、教育与大众传媒的发展状况，还都受限于其时政府、大众传媒业者等政治经济力量的强弱消长，以及新闻传播学界乃至社会的思辨能力与自主意识的培养与建构。

实用主义理念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形成、流行与存续在相当程度上与政府政策和市场机制的推动有关。无论是在威权统治时期还是民主化转型阶段,台湾当局都将新闻传播教育作为实现政治统治、推动现代化建设与进行资本主义扩张的重要工具,并在政策上引导其以美国实用主义新闻传播教育模式作为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使得实用主义理念的形成为落实得到官方认可与制度支持。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在“解严”后教育、文化、传媒等领域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台湾地区新闻传播院系更多地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寻求发展,并以更积极主动的态度采纳实用主义理念的发展倾向。于是,在政府政策与市场机制的支持与引导下,实用主义理念成为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主导性理念,并集中呈现为通过职业训练与专业技术培养积极回应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需求,争取更多的政治支持与经济资助以实现其规模扩张与竞争水平提升的实践路径。

理性主义理念的凸显则得益于台湾地区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结构变动后,社会力量的成长与公民意识的觉醒。正是在此背景下,由于台湾地区新闻传播学界对新闻传播教育中政治干预与经济宰制的抗争,以及对其长期以来依附于美国模式的反思中衍发的本土化诉求与学科自主意识的显现,理性主义理念的形成为才具有了社会基础与生长空间。因此,台湾新闻传播教育中的理性主义理念可被认为是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理念进行反思的产物与一种纠偏机制,它追求学科建制与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力图重建新闻传播教育与政府、业界、学界、社会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并在实践层面强调通过“全人教育”与理性思维的培养,缓冲此前实用主义理念引导下偏向应用与技术取向的新闻传播教育中所出现的系统性与整体性知识欠缺、人文素养缺失、批判能力不足等弊端。

而在台湾地区特殊的历史脉络与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下,经由政党、大众传媒业者与新闻传播学界等各方力量相互角力与博弈,理性主义理念不断与实用主义理念形成汇流。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开始试图将两种理念统一起来,在理性思维、人文素养与专业知识、通识教育与职业训练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并在实践层面探索出诸如学程制、“大一初二不分系”等路径与方法,使得教育理念呈现出一种折衷与融合的发展趋向。

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稳步健康的发展,和实用主义与理性主义两种理念之间更为平衡与相互制约状态的实现息息相关,而这既有赖于台湾地区政治制度与经济体系的不断成熟,也有赖于台湾地区新闻传播学科共识的达成与自主地位的获得。然而,在台湾地区近年来经济发展陷入停滞、民主化进程受限于族群冲突与统独纷争、公民社会尚待崛起的局面下,不仅理性主义理念成长与发展面临着严峻考验,实用主义理念也容易为政治经济势力所操控,这都使得台湾新闻传播教育难以逃脱工具化、世俗化与商品化的窘境,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注释:

- [1] 韩延明《理念、教育理念及大学理念探析》,《教育研究》2003年第9期。
- [2] 卢晓中、刘太琰《大学理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现代大学教育》2003年第6期。
- [3] [11] 程宗明《析论台湾传播学研究/实务的生产(1949—1980)与未来:从政治经济学取向思考对比典范的转向》,1998年, <http://nccui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62740?locale=en-US>。
- [4] 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第四组《宣传手册》,台北:改造出版社,1952年,第37页。转引自林丽云《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台北:远流图书公司,2004年,第75页。
- [5] 熊秋良《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国民党改组后的“党化教育”》,《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卢毅《事与愿违的党化教育——以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为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向芬《大陆时期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评析(1927—1949)》,《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6期。
- [6] 刘昌树《先总统蒋公大众传播思想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80年,第41页。
- [7] 改造委员会《本党当前宣传指导(草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资料》(未出版),1952年。转引自林丽云《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第77页。

- [8]陈飞宝《当代台湾传媒》,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439页。
- [9]谢然之《新闻学论丛》,台北:改造出版社,1963年,第189页。
- [10]黄鹂《论美国新闻教育的职业化》,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 [12][13][14]林丽云《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第131、191-194、190页。
- [15]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大学教育政策白皮书》2001年,第9页 http://history.moe.gov.tw/important_list.asp。
- [16]涂凌波《实用主义影响下学理与术业之并重:再论20世纪初中国新闻教育观念》,《现代传播》2016年第3期。
- [17]潘家庆《我在新闻系的五十年》,见冯建三主编《自反缩不缩?新闻系七十年》,台北: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2005年,第25-26页。
- [18]郑贞铭《中外新闻传播教育》,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第288-292页。
- [19]程宗明《析论台湾传播学研究/实务的生产(1949—1980)与未来:从政治经济学取向思考对比典范的转向》;陈世敏《传播学入门科目的现实与理想》,《新闻学研究》(台北)2000年总第65期。
- [20]翁秀琪《台湾传播教育的回顾与愿景》,《新闻学研究》(台北)2001年总第69期。
- [21]潘家庆、罗文辉、臧国仁《传播教育核心课程规划》,《新闻学研究》(台北)1996年总第53期。
- [22][25]王石番、陈世敏《传播教育课程规划研究》,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委托专案,1996年。转引自翁秀琪《台湾传播教育的回顾与愿景》。
- [23]钟蔚文、臧国仁、陈百龄《传播教育应该教些什么?——几个极端的想法》,《新闻学研究》(台北)1996年总第53期。
- [24]林静伶《几个感性与理性的想法——对〈传播教育应该教些什么?〉的回应》,《新闻学研究》(台北)1996年总第53期;臧国仁《关于传播学如何教的一些想法——以“基础新闻采写”课为例》,《新闻学研究》(台北)2000年总第65期;翁秀琪《台湾传播教育的回顾与愿景》。

[责任编辑:廖哲平]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between Pragmatism and Rationalism: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a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aiwan

YIN Q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Idea is the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the system and practice at the ideological level, and the observation of ideas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to understand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aiwan. Considering the applied attribute of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and it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publicity, as well as the speci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ath 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in Taiwan, the evolution path of the idea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aiwan is uniqu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the idea of pragmatism has been in dominance thanks to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market mechanisms. With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forces and the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of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which benefited from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Taiwan, the idea of rationalism has been developing in the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on the idea of pragmatism. In recent year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aiwan has been exploring the balances among rational thinking, humanistic literacy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between general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al training. As a result, the idea of pragmatism and the idea of rationalism have shifted 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 an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has exhibited an eclectic and convergent orientation.

Keywords: Taiwa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dea, pragmatism, rationalism